李连江：AI的普及会让学术界的『南郭先生』没有立足之地

■本报记者 孙滔

10 年前，李连江的著作《不发表就出局》成为不少青年教师与博士生的案头“生存指南”；10 年后，“非升即走” 引发了更深层的焦虑，而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出现更以不可逆的姿态重塑着知识生产的底座。

当 AI 能快速生成论文，当高校关键绩效考核（KPI）不断加码，年轻学者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当下一些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与技术的侵蚀？

在新作《AI 时代就这样写论文》即将出版前夕，《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连江。李连江认为，AI 的普及会让真正优秀的一批人更加优秀，同时会让学术界混日子的“南郭先生”彻底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平庸的文字 AI 全都能写。因此，“用 AI 写论文，必须誓死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

1 “非升即走”变了味

《中国科学报》：10 年前你出版了《不发表就出局》，当时为什么会起这个书名？

李连江：2015 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时任院长杨开峰请我过去，给年轻老师讲怎样用英文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刊物发文章，目标非常具体，就是中国学者怎样在英语学术界站稳脚跟、讲好中国故事。我一连讲了 6 个上午，录音由我的一位学生整理出来，后来另一位学生建议出版。

起名“不发表就出局”，是因为我在美国留学时听老师们反复讲“Publish or Perish”，直译是不发表就消失、不发表就灭亡，这是美国研究型大学里还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青年教师必须遵守的生存规则。

我的本意是让大家认识到有这么一个关口，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残酷性。我在书里反复讲的，其实是教大家怎样管理和缓解自己的学术焦虑。但这个书名有点像“标题党”，让很多年轻人感到紧张。现实中实然是如此，但应然未必如此。

《中国科学报》：你当年讲的“不发表就出局”，跟国内现在高校普遍推行的“非升即走”，逻辑是一样的吗？

李连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非升即走”变了味。表面上看学的是美国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System），实际上完全不一样。在美国的制度下，学校招一个 Tenure-track（终身教职轨）教师，前提是相信这个人能够留下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我们有些大学，可能只有一个编制名额，却招一二十人来互相竞争。这就把一个原本保护人才的制度变成了极其野蛮的淘汰制。

《中国科学报》：在目前国内的高校体制里，青年教师头上普遍悬着沉重的 KPI。

李连江：这就是管理制度的错位。管理大学极其复杂，但有个基本原则叫“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你如果剥夺了所有老师的自由，那就同时剥夺了天才的自由；你给所有老师充分的自由，哪怕 90%的人在浪费自由，只要有 10%的天才充分利用了自由，国家的人才梯队就建起来了。

现在那些极端的 KPI，是在用行政手段扼杀年轻一代的创造力。这会逼着年轻人无休止地“内卷”，争着去灌水达标。

《中国科学报》：“不发表就出局”，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拿到教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李连江：恰恰相反，“不发表就出局”应该是一个学者的终身规则，它不因为你评上了副教授、正教授就不适用。

在顶尖高校教书的老师，如果没有拿出 100%甚至 120%的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我认为他们就是渎职的。

一个真正的学者只要还在做学问，一生的常态都应该是觉得自己勉为其难、能力不足，必须尽 100%、120%的努力去挑战未知。

2 学术的“金标准”

《中国科学报》：你长期做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现在 AI 的冲击，会惊慌失措吗？

李连江：对我个人来讲，我都快退休了，有什么好惊慌失措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恐怕不是这样，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压力。

《中国科学报》：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AI 究竟能不能动摇人文社会科学的根基？

李连江：我的看法是，AI 的出现不可能动摇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它也改变不了“不发表就出局”的格局。

为什么？因为语言的本质完全不同。纯数学语言、计算机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非人的语言”。它的概念清晰，没有歧义，与人的切身经验没有关系。AI 凭借强大的算力和无懈可击的记忆力，非常容易攻破这种领域。

但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是“人的语言”，字字句句都连着切身的人生经验。AI 不是人，它表面上能看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你让它翻译，它能翻得语法工整，但《好了歌》背后的那种诗情、悲情与人生幻灭感，AI 怎么可能明白？它没有肉身，没有痛苦，它不懂人的心灵。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AI 的强项只是在既有数据的重组？

李连江：对。AI 的能力，完全可以达到人类知识生产的“平均水平”，甚至在语法、用词等形式上达到中上水准。这在技术上来说很了不起，但对学术研究来说却是个陷阱。

学术的生存原则是创新。让 AI 代笔写论文，好比去登泰山，你从岱庙直接坐直升机到了中天门。你一步达到了平均水平，看似爽快，但你没有经历过从山脚一步步攀登的艰难奋斗，你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也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自信。

更要命的是，中天门之后还有十八盘、玉皇顶，你若误以为自己到了南天门甚至上了玉皇顶，你就会习惯于平庸。让 AI 代笔，是沦为平庸的捷径。

《中国科学报》：所以学者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归根结底还是创新？

李连江：核心永远是创新。在人文社科领域，连“人”本身都还没搞明白，更谈不上 AI 替代。

《中国科学报》：在 AI 参与越来越深的背景下，你怎么界定学术的“金标准”？

李连江：评价一篇博士论文或学术著作是否立得住，其实有清晰的两步：第一步，你有没有超越自己的极限；第二步，你的极限有没有超越学术界的现有极限。

李连江

图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

3 在极点处超越极限

《中国科学报》：你经常提到写论文要下“笨功夫”，比如写论文往往要修改几十遍、上百遍。但在如今快节奏的 AI 时代，这种“手搓论文”的功夫还有意义吗？

李连江：首先不能叫“手搓”，论文不是手搓出来的，也不是批量生产的，它是你用心血浇灌出来的。

为什么一篇文章要改上百遍？因为人是有灵性的。你写完初稿，当天觉得写得真好；第二天睡醒再看，看出很多毛病；第三天再看，又发现很多问题。人的灵性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如果全交给 AI，给个提示词就批量生成，你的大脑不用就会退化，用进废退嘛。

我常引用书法家启功先生的一句话：“功夫是准确的重复。”启功先生说练字不是追求写多少张，每天自定课程机械地写是傻办法；写得不准，写得越多越糟，习惯不好改都改不过来。做学问写论文一模一样，修改不是随便乱改，而是每一次都在准确地体会结构、论据和逻辑，一遍遍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出来的东西才能超越平均水平。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里把学术比作跑马拉松。刚好我平时也跑马拉松或超级马拉松。跑超马的过程很奇特，起跑很兴奋，中间会遭遇伤痛、疲惫和极度的心理挣扎，但只要熬过极点，后半程就会迎来一种身心复苏和深层次的愉悦。

李连江：你跑超马的体会太深刻了！学术完全就是这样。

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日常生活的 99%都是极其痛苦、单调的——99%的时间你觉得自己很笨，解不开题、写不下去，只有 1%的时间觉得自己还算聪明。焦虑与痛苦是学者的常态。

跑马拉松也是一样，你在体验痛苦的同时，也体验到了自己居然能忍耐它、战胜它。你忍住了，没有垮掉，没有退赛，这种战胜痛苦的经历本身，带给你的就是最高级的愉悦。

4 导师应是“摆渡人”

《中国科学报》：在当下这种浮躁的环境里，你提及围棋界的传统“内弟子”，后来你办写作培训班也称之为“私塾”。对于提倡这种传统的、类似师徒传承的教育方式，你的初衷是什么？

李连江：学者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打个比方，每一个群体中总有一部分人的大脑极其聪明，但体能可能很差，不适合世俗营生。这些人是智力竞争中的主力军，国家应该设立大学和制度把他们保护起来，不要让他们为琐碎谋生耗费生命。

我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我的恩师车铭洲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师要以学生为目的，不能以学生为手段。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利益竞争，没有嫉妒，学生的成功就是老师的成功。好老师对学生来说是一种精神号召。学生看到老师是这样治学、做人、说话的，他心生敬仰，自然会提升自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徐扬生校长讲过一个词我很赞同，他说教师的责任是当一个“摆渡人”。英文里摆渡人（ferryman）就是渡船船工，但在中国文化和佛教语境里，“渡人”有深层的大慈悲。船工摆渡以此谋生，但他同时把送客人到彼岸当作目的，这完全符合康德讲的伦理——永远要把人当成目的，而不能仅仅当成手段。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理工科的大实验室，一个课题组几十上百人，导师被称为“老板”，学生成了“科研民工”，那种类似师徒传承的关系在现实中似乎很难实现。

李连江：理工科实验室是结构化的研究团队，本质上更像一家公司的雇佣关系。但即便是管理团队，底线也不能丢：你不能去掠夺团队成员的成果。

真正的学问传承，是灵魂层面的沟通。像陈省身先生与法国数学家嘉当、李政道先生与导师费米，那种师承完全是“用灵魂的火点燃另一团火”，这个精髓 AI 取代不了，流水线式的科研团队也取代不了。

5 即将出版的新书

《中国科学报》：你即将出版的新书《AI 时代就这样写论文》，也是从培训班的讲义中提炼出来的吗？

李连江：对。我前两期办网课讲了 24 讲，整理出来的讲稿有 95 万字，那肯定不能出书。后来我花了很大力气，把最核心、最骨干的东西提炼出来，正文大概六七万字。

我把这本书题献给我在南开读大学时教我专业英语的李约瑟老师（注：并非汉学家约瑟夫·李约瑟）。我 1978 年入大学前，连英文字母 ABC 都没学过，是李约瑟老师在我上第一次课后对同学们说“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这句话塑造了我一生的自信，也就是相信我在学外语方面有一点专长。

《中国科学报》：在即将出版的《AI 时代就这样写论文》里，你想传递给读者什么核心理念？

李连江：其实就两条核心信息。第一，在 AI 时代写论文，你必须用 AI。第二，用 AI 写论文，必须誓死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

AI 的普及会让真正优秀的一批人更加优秀，同时会让学术界混日子的“南郭先生”彻底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平庸的文字 AI 全都能写。

一位建筑学者与西藏的 23 年

■本报记者 孟凌霄 通讯员 朱琳

近日，一则在西藏无人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视频在南京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南工大）师生的朋友圈刷屏。镜头里，南工大建筑学院副教授王一丁带着学生行走在阿里札达的土林深处，脚下是干涸的河床，四周是残破的佛塔，身后是如石林般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脉余脉。

视频记录的是几次建筑遗产数据采集画面，而画面之外，是更长的时间刻度。从 2003 年第一次进藏至今，王一丁已经在这片高原上跑了 23 年，进藏二十五六次，最长一次去西藏调研总计 77 天。这是一条极少有人涉足的路。



王一丁在西藏札达县古格王城遗址做监测。 南工大供图

在空白处丈量

2003 年，在职读研的王一丁跟着导师、南工大教授汪永平第一次踏上西藏。汪永平自 1999 年起接受江苏文物局对口支援安排，开始对西藏建筑进行基础调查与测绘。“当时，关于西藏建筑的资料非常有限，搞研究与保护都得先有相关的基础数据支撑。”王一丁回忆道。

那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学术领域。在西藏，尤其是阿里，系统的建筑测绘与类型研究鲜有人做。王一丁说：“与其去钻较成熟研究的缝隙，不如到还有很大研究空白和潜力的地方去。”

阿里正是这样的地方。这里是多元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丝路的支线在此横穿。这里也是北方草原与南亚之间的通道，公元 10 世纪立国的古格王国在此延续 700 余年。建筑的地域性与多元交流特征，在这片土地上层层叠加。2007 年，王一丁第一次到阿里时就被深深吸引：“那么偏远的地方，却有那么多历史悠久的建筑，随便一处，可能就是 11 世纪、12 世纪的遗迹。”

那不是一时兴起的向往。2011 年，王一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就把研究重心锁定在阿里，后来陆续申报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部与阿里有关。之前，他已在汪永平的研究体系里做过寺庙调查、拉萨民居调查、城市调查；此后，他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向西，在空白处一寸寸丈量。

测出来的研究脉络

接受采访中，王一丁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两米多长的札达多香遗址图，河谷的每一道褶皱都收入图中——那是沿河谷绵延 6.7 公里实地布设控制点、逐段航拍建模的结果。它成为学术界第一张多香遗址的航拍测绘图。他说：“没有捷径可走，测绘永远是最笨拙，也是最扎实的基础工作。”

王一丁对阿里的“偏爱”与“厮守”，最初从这片高原的土石与庙堂中生长出来，像一条河流，以“测绘”为源头，流向“守护”的深处。

早在 2018 年至 2019 年，为配合国道 219 线改建工程，受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邀请，王一丁带着团队走进山南洛扎县，对 200 余座碉楼做了调查，详细踏勘、记录了其中 61 座的现状，并全面测绘了 13 座碉楼，采集了 69 个测年样本，完成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对碉楼的系统科学测绘。

测年结果不仅勾勒出近千年的建造史，更显示出这些碉楼并非孤立堡垒，而是紧邻农田、沿水源分布的居住建筑，与村落自然生长规律高度吻合。除具备防御功能之外，它们是温馨的家园。后来，王一丁指导学生在此基础上完成复原设计，让那些沉默的石墙在图纸上重新“立”了起来。

测绘揭开了土地的面纱，而梳理归纳则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土地的“表情”。在阿里地区的寺庙研究中，王一丁与学生熊琦媛对阿里现存 139 座寺庙中的 126 座可判定建造时间的佛殿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出五种平面样式，提出“简—繁—简”的四分期演变规律——从殿堂的形制里，他们读懂了信仰与权力如何塑造空间。对札达盆地生土建筑的研究，他则从材料性能入手，探讨当地土构建筑不耐水的根本原因——只有先了解建筑为何脆弱，才知道如何让它长久地矗立。

同期，王一丁还配合考古机构对发掘后的墓室进行测绘和三维扫描，将先期测绘的数字基底提供给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古人员将这些数据导入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后，探方位置、发掘进度一目了然，文化遗产保护有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 9 月，阿里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王一丁当选副会长兼古建研究室主任，负责协助开展古建筑领域的文史调研与学术探讨。河谷中的脚印化作图纸上的类型图谱，个体的学术积累转化为有组织的学科平台，由点及面、由技入道，他正在实现从“读懂阿里”到“守护阿里”的跨越。

大地上的育人课堂

在阿里做调查，首先要算一笔账。王一丁算过：从南京坐火车进藏要花两天，在拉萨适应高原环境两天，包车往返阿里需要一周，加上各县之间报备联络、交通不便导致的往返损耗，“低于 42 天的考察是亏本的，有效工作时间就会少于 50%”。

2012 年，团队前往卡孜寺遗址开展调查。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队员们背着设备徒步两个半小时才抵达寺庙，当晚住在寺里，第二天完成调查后再原路返回。2016 年，团队在海拔近 5000 米的无人区开展遗址调查，连续工作 3 天。为躲避严寒、风雨和野兽侵袭，队员们不得不在羊圈里度过两个夜晚。2017 年，团队在多香遗址附近的河谷中搭起帐篷，一住就是 8 天，后来又借住其他单位的一处院落，继续驻扎了 11 天。

初到多香遗址，王一丁站在悬崖边用绳子调运仪器，踩踏崖壁时滚落的石子砸中了山下的同伴。当晚，他们连夜跑到 250 公里外的地区医院做检查，万幸只是擦伤，至今仍心有余悸。王一丁还记得，自己下山时满身是泥，连续滑倒，最后用工兵铲猛插入山体中，才止住下滑。

谈及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的种种艰辛，王一丁语气平静。支撑他一路坚持下来的，一是兴趣，二是研究需求。他坦言，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项那年，曾想过要不要停两年，但“马上跳出来一个念头，总觉得还有啥事没干，然后还想去做”。

人才培养是另一重驱动力。2015 年起，王一丁共带了 24 名研究生，已有 16 人毕业。研究选题从多香河谷遗址研究、扎西岗寺建筑研究、阿里佛殿平面形制演变，到洛扎碉楼复原设计、古格研究所建筑设计及西藏建筑类考古文献整理等，形成了一个从基础研究到保护设计的完整链条。

学生关注并研究的“怀斯藏品”——一位喇嘛于 1857—1859 年创作的画作成为近两百年来寺庙变迁的新线索；碉楼测绘的成果被做成 3D 打印笔筒，申请了专利。“学生在田野一线发现问题、历练成长，这一研究脉络要接续下去。”接受采访中，王一丁不时提到自己的学生及他们的研究成果，眼中满是自豪。

“久而久之我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每年不去一趟阿里，总觉得很别扭。”王一丁说。

落日余晖下，城堡、佛殿、古塔、洞窟矗立在金黄的土林中。有人从它们旁边路过，有人为它们停下脚步，王一丁属于后者，一停就是 23 年。他在旷野荒原之中，将这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珍宝一一拾起，捧到世人面前，让更多人看到它们，了解它们。

看“圈”

栏目主持：雨田

李启盛 获“顾毓琇电机工程奖”

11 月 10 日，2026 年“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颁给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启盛，以表彰他在电力系统避雷器技术、特高压标准、过电压保护及绝缘配合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李启盛，1933 年生于中国香港，1952 年考入武汉大学电机系，后随院系调整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他带领团队实现了从阀式、磁吹到氧化锌的三代技术跨越，并主持构建了全电压等级的避雷器国家标准与试验体系。

“顾毓琇电机工程奖”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电力与能源分会于 2010 年联合设立，每年评选一位对推动电机工程科技进步作出重要里程碑式贡献的专家学者，被业界公认为能源电力领域的“终身成就奖”。

郑宇 任北邮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日前，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官网更新显示，郑宇已任北邮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郑宇，1979 年出生于湖南衡阳，本硕博均就读于西南交通大学，2006 年起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先后担任研究员、主管研究员和资深研究经理，2018 年加入京东集团，担任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数据科学家、京东城市总裁。

郑宇在国际上开辟了“城市计算”领域和学科，提出了城市计算理论体系。2016 年，他因为在城市计算领域的贡献被评为美国计算机学会杰出科学家。2020 年 11 月，他因在时空数据挖掘和城市计算领域的贡献被评为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 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21 广告热线：010－62580726 发行热线：010－6258070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 号 零售价：1.00 元 年价：218 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